

从语言角度鉴别早期可疑佛经的方法和步骤

方一新, 高列过

(浙江大学 中文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从比照对象的确立、语言标准的提取两方面, 结合具体的研究实例, 讨论了早期可疑佛经的鉴别方法和步骤。

关键词: 语言鉴别; 佛经; 翻译年代; 可疑

中图分类号: H0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2)02-0001-09

近些年来, 随着研究的深入, 在利用汉译佛经尤其是早期佛经之前, 应对译者及翻译年代进行必要的甄别和鉴定, 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且已有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前辈时贤的相关考辨成果, 对正确利用早期汉译佛经极具参考价值。总结现有早期汉译佛经考辨研究的方法、步骤, 可为我们鉴别更多可疑佛经进而准确利用这些佛经提供参考。

一、比照对象的确立

早期可疑佛经的考辨离不开比较, 在可靠的比照语料中确立恰当的比照对象, 考辨的结论才能令人信服。

史光辉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时, 多以《撰集百缘经》为例,^[1-2] 说明《大方便佛报恩经》的一些语言现象始见于三国译经。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 把《撰集百缘经》归入三国译经, 作为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比照对象, 不太妥当。^①

(一) 比照语料的选取

如何选取可靠的比照语料? 许理和就如何认定哪些是真正的东汉译经提出的标准, 对选取可靠的佛经语料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3]

1. 佛教经录的利用。恰当利用佛教经录等文献学资料, 对目前大藏经题署的早期译经进行辨别, 确定可靠的译经, 是考辨早期可疑佛经的第一步。

我国的佛教经录非常丰富。吕澂引用的佛教经录就有 16 种。^[4] 但以何种经录作为参考依据, 则应当斟酌。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虽编撰时间较早, 收录颇多, 但考核不精, 伪滥不少, 向为学者诟病。许理和的观点是: “我只相信对古代译经的最权威的记载, 即杰出的目录编撰者、佛教学者道安于公元 374 年编的《众经目录》, 另外, 在某些情况下也参考了 4 世纪初支愍度所编目录中的一些记载。”^[5]

《众经目录》后散佚, 其大部分内容保留于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因此, 对早期译经的考辨而言, 最为可信的经录是《出三藏记集》。前文所述的国内外学者, 都以此为据对早期译经的篇目进行考订。

但仅仅依据经录确定可靠译经, 尚嫌证据不足。

如《四十二章经》。从经录来看, 《出三藏记集》确已记载: “《四十二章经》一卷(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 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右一部, 凡一卷。……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 译写此经。”^[6] 但关于此经, 争论迄今。

吕澂: “《四十二章经》不是最初传来的经, 更不是直接的译本, 而是一种经抄(《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一文)。就内容看, 是抄自《法句经》, 我们对出来的有二十八章, 占全经的三分之二。”“我们认定此经是东晋初抄出的。其理

收稿日期: 2011-12-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1AYY004)。

第一作者简介: 方一新(1957-), 男, 浙江黄岩人, 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汉语史。E-mail: fyxin@zju.edu.cn

由:一、此经最初见于东晋成帝时的《支敏度录》,所以它应出在此录之前。二、在惠帝时,道佛争论,王浮著有《老子化胡经》,说佛教是假造诸经,但未提到《四十二章》的名字,可见当时尚无此经,否则王浮决不会目睹这一所谓初传佛典而不加以攻击。因此,此经抄出的年限,最早不能超过《化胡经》,最晚不能晚于《支敏度录》。惠帝末年公元三〇六年,成帝末年为公元三四年,大约就产生于此三十年之间。”吕澂撰有《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②专文论证此经为伪经,可以参看。

对吕先生关于《四十二章经》的论断,肯定有不同的看法。但吕先生这段话提示我们,现存的《四十二章经》从内容和宗教史的角度看,与经录的记载并不一致。可见,经录只是考辨依据之一。

2. 佐证材料。许理和提出了三种佐证材料:“一是译经正文的注释,二是当时或时代很早的序言和版本记录,三是某些经文在中国最早的佛经注解中被引用或提到过,或曾是汉后不久产生的重译本所据的底本。”^[1]在本段的注释中作者提到两种注解:“最早引用或提及汉译佛经的注解有以下两种:一种是 T1694《阴持入经注》(为安世高的 T603《阴持入经》作的注解,作者陈慧),另一种是见于 T225 第一卷的注解。T225《大明度经》的译者已不可考,被误认为支谦所译(参考 Lewis R.Lancaster 的文章《被认作支谦所译的〈大明度经〉》,《华裔学志》第 28 期,1969 年,第 246-257 页)。”

从目前的研究看,佛教类书也是确定可靠佛经篇目的重要依据。

季琴调查了编成于南朝梁天监十五年(公元 516 年)的《经律异相》之后发现:“三国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被征引 15 次,元魏慧觉译的《贤愚经》被征引 58 次,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的《杂宝藏经》仅被征引 1 次,却只字未提《撰集百缘经》;倘若《撰集百缘经》确为三国支谦所译,那么像这样一部在内容、篇幅上不亚于《六度集经》、《贤愚经》、《杂宝藏经》的作品,怎么可能会受到僧旻、宝唱等人的如此冷落?”^[680]可见,旧题《撰集百缘经》不宜视作三国支谦译经。

但有时,依靠佛教经录、类书这些文献学资

料,有些佛经篇目的译者也不能确定。如《太子慕魄经》。方一新、高列过调查显示:“佛教经录表明,南朝梁以前,只有题名竺法护所译的《太子慕魄经》,而佛教类书的引文表明,南朝梁以前的《太子慕魄经》,就是题名为安世高所译的《太子慕魄经》。”^[7]可见文献学的证据有时作用也是有限的。

许理和认为:“根据以上两条,可以确认一些‘里程碑式’的译经,这些经文毫无疑问是已知的一些经师翻译的。”^[8]作者提到了安世高译的《安般守意经》和支娄迦谶译的《道行般若经》。

(二) 比照对象的确立

在可靠的比照语料中,根据考辨目标的不同,再进一步确定恰当的比照对象。

考辨早期可疑佛经,着眼一般有二:真正的译者和比较确切的翻译年代。目标不同,确立的比照对象也就不同。

1. 译者考辨。要考辨一部可疑佛经的译者,比照对象一般选择同一译者的其他语料。

周睦修考辨《无量寿经》的译者时,分别把该经与竺法护、佛陀跋陀罗、宝云的译经相比,最后确认该经当为竺法护所译,而非后二者。^[8]

有关《撰集百缘经》的考辨,季琴、^[69-11]陈祥明^[12]等均把该经与支谦其他译经进行比较,断定该经不是支谦所译。

2. 翻译年代考辨。考辨可疑佛经的翻译年代,比照对象一般选择同时代的其他译经。

有关《大方便佛报恩经》《分别功德论》的考辨,方一新、^[13-14]方一新和高列过、^[15-16]史光辉^[1-2]等学者多选取东汉的可靠佛经与其对比,以说明其不是东汉译经。

确立了比照对象,许理和认为:“(4)用这些‘里程碑式’的译经来进行术语和风格的分析,以便明确各个译经团体在词汇和风格上一些各自的特征。(5)根据第四点,再对现存译经中道安和支愍度定为汉代译作的其他经文作考查,结果,有两部应该排除。”^[9]也就是说,汉译佛经的考辨最终还是要以对经文本身的考察为参照点。

二、语言标准的提取

在考辨早期佛经中,东晋道安等已经注意利用译经的文体、格式以及译语,例如:“又《首楞严三昧经注序》终^③记载之僧祐法师之子注中

转载原道安录之记文云：

安公经录云：中平二年十二月八日，支谶所出，其经首略‘如是我闻’，唯称‘佛在王舍城灵鸟顶山中’。由此可知，道安所见之此经本有中平二年翻译之识语，经之起首无‘如是我闻’句，直以‘佛在王金^④城’云云之文为始。”^⑤

遇笑容、曹广顺指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时期的语言，在语法、词汇上都会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同样，在同时期之内，不同的作者对语言的使用，也会有所不同。通过考查作品的语言，来判定作品的时代和作者，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较单纯依赖文献记载更为科学、可靠。”^{①77}曹广顺、遇笑容认为：“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每一种译经都应该在语言上有其特征，反映某一时代、作者的语言习惯。因此，我们有可能根据语言特征来研究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①81}

随着汉译佛经语言研究的深入，目前学界对某些佛经的语言特征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从语言角度对可疑佛经进行考辨，对明确可疑佛经的翻译年代、译者都是大有帮助的。早期多从词语的角度考察，后来，语法特点也成为重要标准。

（一）词汇标准

以词汇为标准对早期可疑佛经进行考辨，学者们多从译名（含音译词、意译词）、普通词语、常用词、俗语及固定格式等角度进行考辨。

1. 译名（含音译词、意译词）。从佛经翻译史看，早期佛经译名具有明显的个人特点和时代特点，可为译者和翻译时代的判定提供证据。许理和指出：^{①948}“对于中国佛教初期历史而言，翻译所选的文本的性质以及翻译所用的术语，均揭示了汉代佛教的某种基本特征。”^⑥吕澂认为^{②01}《五阴譬喻经》《转法轮经》《法受尘经》《禅行法想经》不能确定为安世高所译，就是从“翻译用语”的角度出发的。^⑦小野玄妙^{②119-20}认为《四十二章经》从序文至正文均是伪作，“其证据可求诸文中使用之译语，例如辟支佛、阿那含等，此均为僧祐法师所谓新经之用语，亦即是笔者于本书所云旧译时代之译语，……《四十二章经》非写于明帝代，经典本身即可提出充分证明。”许理和^{③1}《五阴譬喻经》和《佉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时，其中有一个标准就是“术语”。^⑧

在考辨早期可疑佛经的论文中，佛经译名常

常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下面以《大方便佛报恩经》《旧杂譬喻经》的辨考为例作一说明。

首先看《大方便佛报恩经》。

林显庭指出，^{②21}《大方便佛报恩经》的一些佛经译名，“显为东晋末鸠摩罗什来华主持译经后，始为佛学界普遍沿用者”，作者列举的词目如下：

梵文“anuttara samvaksambodhi”，《大方便佛报恩经》译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鸠摩罗什之前大多译作“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三国支谦译作“无上正真之道”，至鸠摩罗什方才译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梵文“Gandharva”，《大方便佛报恩经》译作“乾闥婆”，而东汉译经多作“乾沓和”或“捷沓和”，鸠摩罗什译经改作“乾闥婆”。

史光辉^{②1-21}指出《大方便佛报恩经》有8个佛经译名，东汉译经并未使用。分别如下：

三国译经始见之译名：摩睺罗伽，东汉译经只用“摩休勒”、“摩睺勒”；夜叉，东汉译经作“闾叉”；涅槃，东汉译经用“泥洹”、“般泥洹”；南无，东汉译经有1例“和南”，如是我闻，东汉译经用“闻如是”；耆婆，东汉译经未见。

另外，“憍陈如”，东晋始见，东汉三国西晋译经作“阿若拘邻”、“拘邻”；“紧那罗”，东汉用“真陀罗”、“甄陀罗”、“甄多罗”。

上述佛经译名的考察，为断定《大方便佛报恩经》非东汉译经提供了重要证据。

再看《旧杂譬喻经》。

梁晓虹^{②31}考察了三国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和旧题吴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两部经佛教专有名词使用的异同：（1）太（泰）山（地狱）：这是《六度集经》常用的专有名词，共出现近四十次，指众生六道轮回中的“地狱”；而在《旧杂譬喻经》中，却未见一例，径直意译为“地狱”或音译为“泥犁”。（2）四果：《六度集经》习惯把须陀洹果意译为“沟港”，斯陀含果意译为“频来”，而《旧杂譬喻经》对“四果”只用音译。

（3）佛的称呼：《六度集经》喜欢在称“佛”的同时，间也插称“众佑”，为梵文的旧意译词；西晋以后，新译为“世尊”；《旧杂譬喻经》则一律称“佛”。（4）除僮：《六度集经》多见。而《旧

杂譬喻经》则均用音译“比丘”。(5)缘觉:康僧会常说成“缘一觉”;“阿罗汉”,又常常音译为“应仪”、“应真”,这些均不见于《旧杂譬喻经》。

《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佛教专有名词使用差别如此明显,可见不是同一译者所译。

2. 普通词语。普通词语数量巨大,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更新、变化也比较明显。下面以《无量寿经》《阿难问事佛吉凶经》的考辨为例作一说明。

周睦修(释德安)指出,^[8]“功作”、“国邑”、“劳苦”、“圣旨”、“姿色”、“寿终”、“游履”、“消化”、“寻”、“底极”、“咨嗟”等词的使用情况,《无量寿经》与竺法护译经相似,而与佛陀跋陀罗、宝云二者的译经有明显的差别,可见《无量寿经》应当是竺法护所译。

方一新、高列过指出,^[24]旧题东汉安世高译《阿难问事佛吉凶经》中的9条词语,可靠的东汉译经都没有用例。如:“仁圣”、“谐偶”、“怨讼”,三国以后译经始见;“康强”、“清高”,魏晋以降方有用例;“阿枉”、“正律”,西晋以后译经始见;“逼促”,东晋以后译经有用例;“估贩”,北魏译经始见。这些词语的运用说明,《阿难问事佛吉凶经》不是东汉译经,当然更不可能是安世高译经。

3. 常用词。汪维辉认为:^{[25][12-13]}“常用词使用频率高,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口头和笔下,很难作伪,是从语言角度判定作品时代的一个可靠根据。早期汉译佛经中有许多译人不明的‘失译’经,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从常用词的角度去推定这些经的实际翻译时代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当然还要结合其他证据)。”学者从这个角度对《侏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兴起行经》《大方便佛报恩经》《菩萨本缘经》《撰集百缘经》进行了考辨。^⑨以《撰集百缘经》的考辨为例。

陈祥明^[12]考辨《撰集百缘经》时,所列语言证据包括“寻/觅”和“呼/唤”两组常用词,作者认为:“我们推测《百缘经》不是支谦译经,其译出年代很可能不早于东晋。”

4. 俗语及固定形式。俗语及固定形式字句简练,通俗形象,也可以成为佛经考辨的证据之一。

林显庭^[22]认为《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

译经,就运用了此类证据:“后汉译经,于大众凝目瞻视世尊处,有译作‘努目看世尊’者,虽合经文原意而病在太质;鸠摩罗什译经时,修改之为‘瞻仰如来,目不暂舍’或‘瞻仰尊颜,目不暂舍’,以求信雅兼顾。今按:《大方便佛报恩经·论议品》中即作‘瞻仰如来,目不暂舍’。”

汪维辉^[26]认为一卷本《般舟三昧经》非东汉支娄迦谶所译时,也运用了此类证据,举一例如下:“一卷本用‘助欢喜’,……支谶译经只用‘助欢欣’,仅见于《道》,……在支谶译经中,‘欢欣’仅见于《道》,^⑩而未见于他经。《道》也用‘欢喜’,但不跟‘助’连用,……就‘助欢喜:助欢欣’这一组合而言,一卷本和支谶译经分用划然。”

方一新、高列过^[7]也列举了《太子慕魄经》中“两目并青”、“乃如是也”、“求死不得,欲生不得”等,其可靠用例均不见于东汉译经,可见旧题安世高译的《太子慕魄经》不是东汉译经。

(二) 语法标准

与词汇相比,语法的变化相对缓慢,比较稳定,系统性比较强,更能显示出时代特点、作者或译者的个人特色。在考辨早期可疑佛经时,语法标准也被广泛使用。

1. 句法。判断句、被动式、疑问句、动补结构、处置式等,常被作为辨伪的句法标准,另外,固定句式也被学者使用。

(1) 判断句。“是”字型判断句是东汉以来发展成熟的新兴句法现象。有关《大方便佛报恩经》、《撰集百缘经》、《菩萨本缘经》考辨的论文,都把判断句作为重要的句法标准之一。

如《大方便佛报恩经》。史光辉指出:^[1-2]该经出现的助动词修饰判断词“是”,东汉译经未见,三国以后,此用法渐渐兴起;“今……是”这一句式是三国以后译经的常见句式,而东汉译经则用“今……是也”。方一新指出:^[13]该经“是”字判断句的否定形式“非是”的出现次数和三国两晋时期的译经相近。

季琴、^[6]陈祥明^[12-27]等也把判断句作为标准之一,对《撰集百缘经》、《菩萨本缘经》的译者和翻译年代进行了考辨。

(2) 被动式。汉语被动式类型多,历时变化明显。中古汉语的被动式很有特点,许多佛经

考辨文章都以此为鉴别标准之一。

曹广顺、遇笑容^[18]从“被”字句、“为(见)”字句的出现频率,所占比例和“被”字后是否出现施动者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旧杂譬喻经》所处的时代大致在三国前后。颜洽茂、熊娟、^[28]陈祥明^[27]都指出:《菩萨本缘经》与支谦译经被动式面貌差别明显,认为该经不是支谦的译经。另外,方一新、^[13-14]方一新和高列过^[15]对《大方便佛报恩经》《兴起行经》《分别功德论》的考辨也把被动式作为句法标准之一。

(3) 疑问句。中古汉语时期,疑问句产生了许多新的形式,时代特色鲜明,很多文章都以此为考辨的句法标准。这里以《撰集百缘经》的考辨为例作些介绍。^①

季琴^[6]指出:带“不审”疑问句,东汉《中本起经》有用例,支谦译经及其他三国译经没有,但《撰集百缘经》有9处;季琴指出:^[6, 11]从《撰集百缘经》“颇 VP 不”式反复问句的用例情况来看,该经更接近于南北朝译经。

陈祥明^[12]比较了《撰集百缘经》与支谦18部译经,指出在“颇(叵)、岂、宁”作疑问副词的疑问句的使用上,《撰集百缘经》只用中古新兴的“颇”,不用“岂”、“宁”;而支谦译经恰好相反;同时,《撰集百缘经》与支谦译经的选择问句在关联词方面不同:前者“为、为是、为当”三者并用,后者只用“为”。目前的研究表明,“为是”“为当”作选择问句的关联词语分别不早于西晋和东晋,可见《撰集百缘经》的翻译年代不早于西晋。

除判断句、被动句、疑问句外,动词连用格式、动补结构、处置式、存在句等,也被作为句法标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②

(4) 固定句式。固定句式的形成发展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色,对考辨佛经的年代也很有帮助。这里以对旧题东汉安世高译《太子慕魄经》的考辨为例作些说明。^③

方一新、高列过指出,^[7]该经有些固定句式,见于三国、西晋以后的文献。如:“~怪所以”,译者或年代明确的较早书证当为三国、西晋的用例;“V 着一面”,西晋以后译经常见;“了不复”,佛典中可靠的用例较早见于西晋佛经;“未+动词+顷”(“顷”表示时段),见于西晋以后的文

献;“动词+取+宾语”(“取”没有实义),见于三国以来的典籍。

从这些固定句式看,这部《太子慕魄经》应该不是东汉译经。

2. 词法。在词法标准中,虚词非常常见,另外还有构词法等。

(1) 动词。遇笑容、曹广顺^[17]考察了《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撰集百缘经》的完成动词,发现《撰集百缘经》《旧杂譬喻经》中“已”均占很大优势;《六度集经》中“已/竟”合起来,也有明显优势,但仍有从“迄/毕”向“已/竟”过渡的痕迹。可见《旧杂譬喻经》与《六度集经》可能不是同一译者。

(2) 副词。以副词为考辨标准时,学者们分别从新兴副词、副词的使用频率、副词的历时更替等角度进行论证。下面各举一二例。

新兴副词。如“定是”,方一新指出^[29]乃三国以后出现的新兴副词;又如“甚用”,^④方一新、高列过指出,^[7]这是一个西晋以后出现的新兴副词。

副词的使用频率。梁晓虹^[23]指出《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作状语的程度副词“大”的使用频率不同:《旧杂譬喻经》中“大”较为多见;类似的用法《六度集经》也有,但并不多见。遇笑容、曹广顺^[17]调查发现,《六度集经》总括副词“都”的使用频率相差很大。据此可以推断,这两部经可能不是同一译者。

副词的历时更替。季琴指出:^[6, 11]在可靠的支谦译经里“稍”仍然占优势,然而在《撰集百缘经》里“稍”却销声匿迹,单音节副词“渐”独用多达44次,并且双音节副词“渐次”在《撰集百缘经》里出现了11次。可见,《撰集百缘经》很可能不是支谦所译。

(3) 代词。中古时期,汉语的代词系统面貌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为考辨早期可疑佛经提供了很好的鉴定标准。目前的考辨文章,特指疑问代词作鉴定标准的比较多。

1) 特指疑问代词。以特指疑问代词为考辨标准时,学者们分别从新兴词语、使用频率、用法、历时更替等角度进行论证。下面各举一二例。

新兴特指疑问代词。如:在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时,方一新、^[13]方一新和高列过^[16]指

出,该经中“何因缘故”、“以/因何事故”、“何处”、“何事”等,可靠的东汉译经没有用例。考辨《佛说榕女祇域因缘经》时,方一新^[29]指出,该经的时间疑问代词“何当”、“久近”,东汉佛经未见。

疑问代词的使用频率。方一新、高列过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时,指出:^[16]东汉佛经使用不多的“云何”在该经中广泛使用;东汉佛经频繁使用的“何等”,该经使用很少;东汉佛经中比较活跃的“何所”,在该经中呈现萎缩之势;“何”在东汉佛经中的使用频率比该经高。该经这几个疑问代词的使用面貌更接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

疑问代词的用法。方一新、高列过指出:^[16]“何因缘”与表示事物疑问的“何所”二者的用法,东汉佛经与《大方便佛报恩经》差别很大:东汉佛经“何因缘”用于原因疑问句41次,34例作状语,1次作动词宾语,5次作介词“从”的宾语,1次单独使用;而《大方便佛报恩经》中,“何因缘”也用于原因疑问句,有10例,但有9例都是作介词“以”的后置宾语。东汉佛经表示事物疑问的“何所”,作宾语2例,1例作动词后置宾语,1例作动词前置宾语;《大方便佛报恩经》事物疑问句运用“何所”的12例,11例作动词前置宾语。其中“何所作为”7例,“何所归依”4例,作介词“为”的前置宾语1例。

疑问代词的替换。陈祥明^[12]指出:支谦译经“所以者何”全部用来询问原因,而《撰集百缘经》未见“所以者何”,主要用“何因缘”、“何缘”、“何故”来询问原因。卢巧琴指出:^[30]安世高译经常用“何以故”询问原因,而《五阴譬喻经》却用“所以者何”。

2) 人称代词。学者多以同一指称下不同代词使用频率的差异作为鉴别标准。

如第一人称代词。胡敕瑞指出:^[31]安世高译经中第一人称代词几乎都用“我”(共162例),只有两例“吾”,而这例外的两例正出现在《法受尘经》中,这可以作为证明《法受尘经》不是安世高所出的证据之一。

第二人称代词。汪维辉指出:^[26]一卷本《般舟三昧经》第二人称代词用“汝”(共13见,其

中“汝等”3见);而支谶译《道行般若经》一般用“汝”,但也用“若”。一卷本《般舟三昧经》不用“若”,与支谶不合。

3) 人称代词的复数表达。史光辉指出:^[32]支谶译经常用“是曹、我曹、卿曹、若曹、曹辈、曹等辈、曹等”等来表达多数;而《侏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中不见“曹”,只用“等”,这与支谶译经很不相同。

(4) 句尾语气助词。以句尾语气助词作为鉴别标准,学者大多从两个方面切入考察:疑问句语气助词、语气助词的句型分布。

疑问句语气助词。方一新、高列过指出^[15]《分别功德论》与东汉译经疑问语气助词在使用频率、种类及分布比例、新兴疑问语气助词“那”的使用等方面情况迥异,据此可以判断该经不是东汉译经。颜洽茂、熊娟^[28]对支谦一些可靠译经中用于特指问句和是非问句的疑问语气词“耶”和“乎”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菩萨本缘经》“耶”和“乎”的使用频率(50:8)不仅与支谦译经(65:112)很不相同,而且与其他三国时期译经也不同。可见《菩萨本缘经》不像是支谦译经,也不是三国译经。

语气助词的句型分布。汪维辉^[26]对一卷本《般舟三昧经》和支谶所译《道行般若经》中的“耶”、“乎”、“也”三个句尾语气词作了调查统计,如表:

	耶		乎		也	
	选择问句	一般问句	选择问句	一般问句	陈述句	疑问句
一卷本	0	0	0	3	11	4
《道》	6	25	6	26	111	0

作者进而对表格进行了说明分析:

第一,支谶多用“耶”,《道行般若经》中就有31例,有两种用法:用于选择问句,与“乎”搭配使用;用于一般疑问句。而一卷本《般舟三昧经》表示疑问语气不用“耶”,而是用“乎”和“也”。第二,一卷本《般舟三昧经》“乎”都用于一般疑问句,而《道行般若经》中,“乎”用于一般疑问句和选择问句。第三,《道行般若经》“也”全部用于陈述句,而一卷本《般舟三昧经》“也”用于陈述句和疑问句。

另外,助动词、介词、连词、量词、个案虚

词等，也有学者用作鉴别标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15]

(5) 构词法。方一新指出，^[13]《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切”式词语，多见于魏晋以后的典籍，可见该经不是东汉译经；周睦修^[8]考察了《无量寿经》中的若干AA式、AABB式、双动宾结构的词语，指出该经应该是西晋竺法护所译。

附带说明的是，张诒三^[33]从词语搭配的角度进行了考察，认为《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译经。^[16]

(三) 行文风格

时代不同，译者不同，汉译佛经的行文风格也不尽相同。因此，对可疑佛经的行文风格进行考察，也成为考辨佛经的语言学手段之一。学者多从以下几个角度着手。

1. 开头语。周睦修指出：^[8]“《无量寿经》序分包含了竺法护译经常用的‘一切大圣’、‘神通’、‘总持’、‘辩才’等词，这几个用词在语序上也与竺法护的译经语序一致。《无量寿经》出现特殊规格的开场套语，是‘竺法护译经团队’才有的语言特征。”据此可知《无量寿经》当是竺法护所译。

胡敕瑞^[31]以首句的差异作为鉴别《法受尘经》非安世高所译的证据之一：“安世高译经首句多是‘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而此经首句是‘闻如是，一时佛游于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方一新、高列过调查发现，^[34]《佛说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闻如是：一时佛至罗阅祇耆闍崛山中，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这样的开头，是东汉后期支娄迦谶以来才开始使用的句式，安世高译经尚未见到。可见该经不当视作安世高译经。

颜洽茂、熊娟^[28]指出：在可靠的支谦译经中，有20部译经首句都是“闻如是，一时佛在（遊）……”，其他三部佛经《阿弥陀三耶三佛菩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太子瑞应本起经》《了本生死经》的开场直接以“佛”开头，而《菩萨本缘经》的开场语则与此都不同，第一句往往是“我昔曾闻”、“如我曾闻”（第三品为“如我昔曾闻”）；第二句往往是“过去有王……”、“菩萨往昔（往

世）”等，可见把《菩萨本缘经》视作支谦译经是有问题的。

2. 结束语。出本充代考察了《撰集百缘经》和《贤愚经》的结束语：“《撰集百缘经》中，每个故事结束时，一般用如下定型句（一百话中九十八话用了这一句）：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而《撰集百缘经》第九八话《恒伽达缘》用的是如下表现：佛说此已，诸在会者信敬欢喜，顶戴奉行。（255a14）这一说法也抄袭了《贤愚经》《恒伽达品》中的如下表现：佛说此已，诸在会者信敬欢喜，顶受奉行。（356a11）”^[17]出本充代博士把这一点作为《撰集百缘经》抄译自《贤愚经》的证据之一。

方一新、高列过指出，^[34]《佛说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的结束语与安世高译经差异明显，表现为三点：第一，安译佛经都说“佛说是”、“佛说如是”、“佛说是已”等，不说“佛说是经”。第二，安译佛经受众比较简单，通常是个人（如“阿难”）、比丘、诸菩萨等，也经常统称“皆”；不像此经把“舍利弗罗汉、文殊师利菩萨、诸天人间人民、龙鬼神”悉数列出。第三，末尾语，安译佛经通常是“受行”、“皆欢喜”、“皆欢喜受（行）”、“皆大欢喜”等，不似此经云“一切欢喜，作礼而去”。因此可以判断该经非安世高所译。

3. 句子格式。就笔者所见，俞理明以四言格句式为依据，对《四十二章》进行过考辨，指出：“四字格约占全部句数的一半，用字数占百分之四十五，超过居第二位的五言句一倍以上。四言句本是汉语常见的文句，用例较多，但《四十二章经》中的这个比率，还是偏高的。具体到各章节来看，约三分之一的章节符合四言格文体标准；近半数的章节四言句不足全部句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不少章节是靠非四言的排比句来保持句式的整齐的。……从文体特征来考虑，汉末译经四言格的产生，使得抄经人能够从部份以四言格写成的经文中抄录经文，《四十二章经》的出现，当然也在汉末或者更晚些时候。旧说认为《四十二章经》是最早的汉文佛经，但在支曜《成具光明定意经》以前，译师们没有连用多个四言句的习惯，经文中的排比句也很少用，草创期译师们在为克服辞不达意而努力的时候，是无暇顾及

词句的雕琢的。……《四十二章经》是汉末以后产生的,它不可能是最早的汉译佛经,它的来源也可能不只是一种经文,当然也有可能包括最早译出的汉文佛经。”^{[35]25-29}

4. 特定场合的套语。(1) 对话形式。周睦修指出:^[8]“当《无量寿经》的译者使用‘对曰’时,是用于下辈回答上辈的场合,全经6处没有例外。提问人所问的内容,多用在‘要求证实’的问句上,所问的多与‘是否见闻’有关,且答话人的回答简洁,很多时候仅用二字或四字来答复。”竺法护译经“无论是从语境或用法来看,都呈现出一种固定的对话形式或内容,与《无量寿经》相当”,“从与‘对曰’有关的对话形式来看,《无量寿经》与竺法护译经在使用场合上的类型颇为一致,佛陀跋陀罗、宝云却见不到类似用法,据此分析《无量寿经》应为竺法护所译。”

(2) 出场套语。出本充代指出:《撰集百缘经》第九八话《恒伽达缘》和《贤愚经》第六话《恒伽达品》中的语词更为一致。《撰集百缘经》的其它故事中,表现主人公出家场面时,一般用如下定型句:

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门,精勤修习,得阿罗汉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脱。诸天、世人所见敬仰。

而在《撰集百缘经》第九八话《恒伽达缘》中,如下描写同一场面:

于时,如来听为沙门。法服在体,使(v.l. 便)为比丘。佛为说法,心开意解,得阿罗汉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脱。(254c7f.)

这一说法显然沿袭了《贤愚经》第六话《恒伽达品》中的如下表现:

于时,如来听为沙门。法衣在体,便成比丘。佛为说法,心意开畅,成罗汉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脱。(355c11f.)

出本充代博士也把这一点作为《撰集百缘经》抄译自《贤愚经》的证据之一。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梁晓虹^[23]还从文体的角度对《旧杂譬喻经》作了考辨:“总的说来,《六度集经》所译时代较早,加之译者康僧会的汉语水平又比较高,所以译文典雅流畅,读起来文言气息比较浓;而后者因时代较后,故白话味道较足。”

近年来,从梵汉对勘的角度对可疑佛经进行考辨,也有学者尝试,如出本充代博士等。笔者所见有限,姑且从略。

方一新指出:^[13]“通过语法、词汇的某些用法来鉴定佛经的翻译年代,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比如,东汉和三国、西晋的时代较近,有些语言现象未必就能一刀两断,区分得一清二楚。又如,如何选择鉴别的标准,提取作鉴别用的有价值的区别性语言特征,也是十分棘手的事,鉴别标准提取得不准确,则结论可想而知。再如,古书浩如烟海,个人所见有限,说某种语言现象只见于某一时代或始见于何人何书,也很难说。”总体来看,从语言角度对早期可疑佛经进行考辨,词汇、语法均是有效的手段,但怎样利用这种手段,使考辨的结论更有价值,确实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注释:

- ① 《撰集百缘经》已有一批学者作过考辨,认为不是可靠的三国译经,相关考辨成果详见下文。
- ② 参见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276页。
- ③ 终,当是“中”之误。
- ④ 金,当作“舍”。
- ⑤ 见【日本】小野玄妙(1983:26)。
- ⑥ 见许里和(1998:48)。按:许里和,即许理和。
- ⑦ 吕澂(1980:3)认为:“从翻译用语等对勘,《五阴譬喻经》、《转法轮经》、《法受生经》、《禅行法想经》四部是否世高所译,尚有问题。”
- ⑧ 许理和(2001:309)《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认为《五阴譬喻经》“无疑是早期译经,但是它的风格和术语绝对不同于安世高及其译经团体的译文”;《佉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从风格和术语来看,它极有可能是真正的汉代译经,尽管我们还不肯肯定它就是支娄迦讫所译”。
- ⑨ 关于《大方便佛报恩经》,史光辉(2001、2009)考察了“侧/边”、“牧/放”等;胡救瑞(2005)考察了“求、索/觅”、“呼/唤”、“见/看”等;关于《撰集百缘经》,季琴(2004)、(2006)考察了“看/视”、“牧/放”以及“脚”等;陈祥明(2009)考察了“寻/觅”、“呼/唤”等;另外,方一新(2003)考察了“疼/痛”;史光辉(2005)考察了“求/索”;陈祥明(2010)考察了“寻/觅”、“呼/唤”。
- ⑩ 《道》,乃《道行般若经》的简称。
- ⑪ 此类论文还有:陈祥明(2010),方一新(2003)(2008),方一新,高列过(2003)(2008),高列过(2009《东汉佛经疑问代词“何等”“何”地位演变差异探究》,《浙江教育学院学报》第6期),汪维辉(2007),史光辉(2001),周睦修(释德安)(2005)。
- ⑫ 以动词连用格式为考辨标准的文章有:曹广顺,遇笑容(2000);季琴(2004)(2009);遇笑容,曹广顺(1998)。以动补结构为考辨标准的文章有:方一新(2003)。以处置式为考辨标准的文

- 章有：曹广顺，遇笑容（2000）。另外，王建军（2003《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305页）从存在句和行为动词句的角度对《大方便佛报恩经》做过考辨。
- ⑬ 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文章以独词句“非也”为鉴定标准的有：史光辉（2001），方一新（2001《〈大方便佛报恩经〉语汇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2003）；考辨《佛说楞女祇域因缘经》的文章，以“不减于”、“既……且……”、“初不/初无”、“了不可”等为鉴定标准，见方一新（2008）；考辨《阿难问事佛吉凶经》的文章，把“且……且……”作为鉴定标准，见方一新、高列过（2008）。
- ⑭ “甚用”用在情感动词前，表示“非常”之义。但对于“甚用”的结构，季琴认为乃副词“甚”与介词“用”连文而成，见季琴（2004/2009）。时良兵（2004《支谦译经副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认为“用”有词尾倾向。
- ⑮ 以助动词和量词为考辨标准的有：陈祥明（2010）。以介词为考辨标准的有：季琴（2004）（2009）。以连词为考辨标准的有：胡敕瑞（2005），方一新（2008）。以个案虚词为考辨标准的有：周睦修（2005）。
- ⑯ 张诒三（2005：311—313）指出：“饮”与表示心理活动的名词搭配使用，是在三国至南北朝的齐梁时代；而《大方便佛报恩经》中有三例“饮气”，意思是忍气吞声，“气”是“气愤”，是表示心理活动的名词。可见，该经的翻译年代不会早于三国。
- ⑰ 辛岛静志《〈撰集百缘经〉的译出年代考证———以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简介》，《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 报恩经》为例[J]. 古汉语研究，2003（3）：77—83.
- [14] 方一新. 《兴起行经》翻译年代初探[C]//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编委会. 中国语言学：第十一期.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5] 方一新，高列过.《分别功德论》翻译年代初探[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92—99.
- [16] 方一新，高列过. 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J]. 语言研究，2005（3）：54—57.
- [17] 遇笑容，曹广顺. 也从语言上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问题[J]. 古汉语研究，1998（2）：4—7.
- [18] 曹广顺，遇笑容. 从语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以《旧杂譬喻经》为例[C]//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辑. 成都：巴蜀书社，2000.
- [19] 许里和. 佛教征服中国[M]. 李四龙，裴勇，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 [20] 吕澂.《安世高》、《支娄迦讖》条[C]//中国佛教协会. 中国佛教：第二辑.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
- [21] 小野玄妙. 佛教经典总论[M]. 杨白衣，译.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22] 林显庭. 大方便佛报恩经纂考及其唐代变文[J]. 中国文化月刊，1987（91）：65—91.
- [23] 梁晓虹. 从语言上判断《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J]. 中国语文通讯，1996（40）：62—68.
- [24] 方一新，高列过. 旧题东汉安世高译《阿难问事佛吉凶经》考辨[C]//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十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5] 汪维辉.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26] 汪维辉. 从语言角度论一卷本《般舟三昧经》非支讖所译[C]//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五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27] 陈祥明. 从语言角度看《菩萨本缘经》的译者及翻译年代[J]. 长江学术，2010（2）：152—160.
- [28] 颜洽茂，熊娟.《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56—64.
- [29] 方一新.《佛说楞女祇域因缘经》翻译年代考辨[C]//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汉语史学报：第七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 [30] 卢巧琴.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整理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09.
- [31] 胡敕瑞. 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C]//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汉语史学报：第五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32] 史光辉. 从语言角度判定《他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非支讖所译[C]//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汉语史学报：第五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33] 张诒三.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2005.
- [34] 方一新，高列过. 题安世高译《佛说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考辨[C]//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辑. 成都：巴蜀书社，2007.
- [35] 俞理明. 佛经文献语言[M]. 成都：巴蜀书社，1993.

(下转第26页)

参考文献

- [1] 史光辉. 东汉佛经词汇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01.
- [2] 史光辉. 从语言角度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J]. 古汉语研究，2009（3）：44—50.
- [3] 许理和. 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C]. 顾满林，译//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 成都：巴蜀书社，2001.
- [4] 吕澂. 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说明[M]. 济南：齐鲁书社，1980.
- [5] 释僧祐. 出三藏记集[M]. 苏晋仁，萧鍊子，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5：23.
- [6] 季琴. 三国支谦译经词汇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04.
- [7] 方一新，高列过. 旧题安世高译《太子墓魄经》翻译年代考辨——兼论题竺法护译《太子墓魄经》的年代问题[J]. 文史，2008（3）：77—99.
- [8] 周睦修（释德安）.《无量寿经》译者考——以佛经语言学为研究主轴[D]. 嘉义：台湾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2005.
- [9] 季琴. 从词汇的角度看《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及成书年代[J]. 宗教学研究，2006（4）：64—68.
- [10] 季琴. 从词语的角度看《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及成书年代[J].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1）：19—23.
- [11] 季琴. 从语法角度看《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及成书年代[J]. 语言研究，2009（1）：105—109.
- [12] 陈祥明. 从语言角度看《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及翻译年代[J]. 语言研究，2009（1）：95—104.
- [13] 方一新. 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

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199.

On Liu Yong's Contribution to Landscape Poetical Writing of the Song Dynasty

LI Liang-wei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and Communi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Liu Yong make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landscape poetical writing in the Song Dynasty. He promotes folk music and creates a new melody in long verses, thus providing an effective vehicle for depicting landscape features. Due to the refinement of long verses deriving from his poeticization of landscape features, the landscape features in his refined poems turn out to be characterized a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His description of landscape, gardens and cities enriches the means of representation by Bai Juyi and Pan Lang, and it proves to be more delicate and impressive. He expresses his feelings by portraying landscape on his wandering journey, and as a result he enriches experiences in writing poems that integrate landscape features and emotions. His poetic writings of landscape and cities broaden the vista of traditional poetic writings that are confined in portraying landscape, opening up a significant way to further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poems.

Keywords: Liu Yong; landscape poems; 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 张文鸯)

(上接第 9 页)

On the Linguistic Methods and Processes of Discerning Dubious Early Buddhist Scriptures

FANG Yi-xin, GAO Lie-guo

(Department of Chines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With practical case stud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ferential markers and the linguistic standards for the discerning of the dubious early Buddhist scriptures.

Keywords: linguistic discerning; Buddhist scriptures; time of translation; dubiousness

(责任编辑 王 抒)